

孙伏园:每周催鲁迅写一段《阿Q正传》

《阿Q正传》几乎人人皆知,它写于1921年12月,最初在报纸上连载,后收入小说集《呐喊》,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1922年2月,如果《晨报副镌》的编辑孙伏园不出那趟差,也许我们如今看到的《阿Q正传》会写得更长。

“阿Q”是被孙伏园“催生”出来的

鲁迅被孙编辑“折磨”了两个多月,有些想把连载中的阿Q结束掉的意思。但孙伏园认定:“《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之趋势,我极盼望尽管宽心地写下去。”说过此话,孙伏园出了趟差,由另一位编辑代理编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报上发表了“大团圆”一章。等到3月底,孙伏园返回北京,阿Q已被主张“惩一儆百”的“把总”枪毙一个多月了。

其实,阿Q本就被孙伏园“催生”出来的。据鲁迅回忆,“他(孙伏园)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突然想起来,晚上便写……”

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镌》上连载。鲁迅说,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

在曹聚仁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

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已臻化境”:(孙伏园)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我们从周氏兄弟的随笔中,就可以看到这位孙先生的神情。圆圆脸,一团和气,跨进门来,让你知道该是交稿的时候了。”

孙伏园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最初叫《晨报附镌》,是他请鲁迅起的,结果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改名为《晨报副刊》,“副刊”一词方始确定下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辞条说,孙伏园是中国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四大副刊成为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北京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其中,前两种都是在孙伏园主持下,开出一代风气的。



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一生两次离职,是为了鲁迅和郭沫若

作为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一生遭遇过两次停编事件:一次为了鲁迅,一次为了郭沫若。

1924年10月的一天,本已被孙伏园编入《晨报副镌》大样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他正在生闷气,刘勉己走过来解释,说是那首诗实在要不得。孙伏园一时火起,举手一巴掌打过去,刘勉己躲过,他还要追着打,最后被同事拦住。

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了编辑职务,后来被邵飘萍邀去编《京报副刊》。

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历史剧《屈原》,一些报刊争相要发表,

最后应《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请求,发表在《中央日报》上。有国民党要员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于是下令撤销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认为,“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再到三十年代,报纸副刊的活力在于它是相对独立于报纸的。报纸的副刊主要是委托外面的人编的,是著名的作家、学者来编的。当年,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介入北方的报纸,中央大学的教授介入南京的报纸。而且他们只负责稿子,不负责营销。老板是把副刊当做报纸的门面来考

虑,不考虑这个版具体的读者量问题。”当年,邵飘萍创办的《京报》最多时拥有23种副刊,他曾发表声明:“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此皆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

而为了鲁迅和郭沫若两次离职的著名编辑孙伏园,从30多岁就蓄起一大把胡须,时人戏称为“伏老”。1926年,他的散文集《伏园游记》出版,封面由蔡元培题写书名,他的弟弟为他画像。

出版史研究专家王建辉评价:“颇传神。”

徐百柯《民国风度》



孙伏园



《晨报副镌》



漫画中的阿Q

信子裙和大岛茂风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曾风靡神州大地。

女主人公信子和他父亲大岛茂的故事颇使不少人感动得流泪,精明的商家从中看出了市场机遇。上海一家服装厂推出了信子裙,北京一家服装厂推出了大岛茂风衣。但结果很不一样。上海的厂家大获其利,北京的厂家却亏本了。其原因在于不同消费者的不同行为。效用理论正是解释消费者行为的。

消费者购买物品是为了从消费这种物品中得到物质或精神的满足。经济学家把这种满足称为效用。满足程度高就是效用大,满足程度低就是效用小。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是实现效用最大化。效用理论正是说明消费者在收入与商品价格既定时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

经济学所说的效用不同于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产生于物品的属性,是客观的。效用是消费

者消费某物品时的感受,是主观的。某种物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因人而异,效用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偏好,没有客观标准。庄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这形象地说明了效用的主观性。鱼在水中畅游是被生存所逼苦不堪言,还是悠然自得其乐无穷,只能由鱼自己的感受来决定。

同样,都是根据《血疑》而开发的衣服却有不同命运,就是因为女中学生与中年男子从衣服中得到的效用不同。女中学生崇尚信子,穿信子裙可以得到极大的效用。中年男子虽然尊敬大岛茂这样的父亲,但并不以穿同样的衣服为荣,大岛茂风衣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效用。

消费者根据他们从物品中得到的效用来决定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即需求价格)。效用大,即消费者对物品主观评价高,消费者才愿意出高价。女中学生认为信子裙带来的效用大,即主观评价高,所以,愿意用高价购买,厂家当然获利。但中年男子并不认为大岛茂风衣有什么效用,即主观评价低,所以,不愿意出高价,当厂家的定价高于他们的需求价格时卖不出去,不赔才怪。

效用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规律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是指某物品消费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效用。边际效用递减是指随着某种物品消费量的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被称为一个规律。

这种现象从生理学上来解释,就是神经元对等量外界刺激的条件反射强度随刺激次数的增加而递减。消费者购买物品就是提供一种刺激,神经元的反射就是满足式效用。中国人爱说,好吃不过饺子。其实让你天天吃饺子,你肯定受不了,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证明。

信子裙和大岛茂风衣的故事也同样包含了边际效用递减的含义。在女中学生看来,信子裙和其他裙子不同,尽管已经有了不少其他裙子,但多买一条信子裙是买了另一件物品,不会有边际效用递减。而在中年男子看来,大岛茂风衣和其他风衣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已有一件风衣,再买一件大岛茂风衣就有了两件同样的风衣,边际效用肯定递减。这样,女中学生愿意出高价买信子裙,而中年男子甚至不愿意用同样的价格买一件大岛茂风衣。上海

厂家赚、北京厂家亏就是必然的了。这里的关键是,女中学生把信子裙和其他裙子作为不同的物品,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中年男子把大岛茂风衣和其他风衣作为同样的物品,存在边际效用递减。

效用理论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但对企业也有意义。企业要为消费者服务,生产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大效用的物品。效用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评价,企业必须研究消费者心理。一家服装企业如果总生产同一种衣服,消费者只买一件就够了。如果生产出不同式样、颜色的衣服,消费者多买几件也不会有边际效用递减,服装的销路不就增加了吗?现在市场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企业生产出了大量相同的物品,消费者买了要效用递减,谁会问津呢?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卖不出的产品,只有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这种产品就是引起效用递减的产品。

上海的厂家增加了裙子产量而没有引起边际效用递减,北京的厂家增加了风衣的产量而引起边际效用递减。其根源在于对消费者心理了解的深度不同。

梁小民《经济学就这么有趣》